



体制的突破

——北京市西城区个体户研究

- 中国第一本研究个体户的学术专著
- 社会学博士亲自参与观察所见
- 丰富的实证材料与透辟的理论分析

时宪民 著

体制的突破—— 北京市西城区个体户研究

时 宪 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体制的突破——北京市西城区个体户研究/时宪民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4
ISBN 7-5004-1346-7

I 体…

II 时…

III 个体经济-研究-北京

IV. F121. 2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328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 8.50 元

谨以此书献给

为中国城市社会结构转型作出特殊贡献的个体户

序 言

改革前，在“左”的思想和政策影响下，个体户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要被割掉。1952年，全国有城市个体户883万人，到1978年便只剩15万人了。经过“文革”，个体户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党政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自此以后，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策，这就为个体户的存在和发展开创了新路。中国还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改变这种落后局面，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而个体户的兴起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1991年城市个体户由1978年的15万人增加到了760万人，成为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个体户指自有生产资料，能独立自主从事劳动或经营的社会经济细胞。不同社会都存在个体户，封建社会有，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个体户也就是个体经济，属于私有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体户还能存在吗？还能发挥积极作用吗？这是人们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是否定的，其后才肯定下来。这是关系到个体户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命运的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个体户在

发展生产力、搞活经济、扩大就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它已成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和整合的重要力量。

个体户研究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对个体户迅速兴起的原因、发展的历程、产生的影响和当前的情况等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探索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近年来报章杂志发表的一些关于个体户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多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的。但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个体户也非常重要。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时宪民同志的博士论文（原名《个体户与北京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这本书即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个体户的。作者通过北京市西城区个体户的调查，从一个侧面探讨北京市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历程，从而填补了个体户研究的一项空白。

这本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者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选择了北京市西城区为研究现场，采用参与观察法进行个案研究，并参考了必要的文献。作者深入到一个个体户群体达一年多时间，逐步与该小群体的成员在生活上打成一片，建立了互相信赖的关系。这样，作者不但亲眼看到他们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和他们的社会关系，而且还了解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心态。因此，他收集到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十分可贵。另外，作者还收集了个案研究材料五十多份，都是访谈的原始记录，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个体户。个体户的本来面貌和生动形象，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是社会学微观研究的重要方法，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作者掌握了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加上文献资料，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作者以定性为取向，从微观层次的研究入手，进行宏观层次理论分析并使二者结合起来，作了有益的尝试。作者认为任何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都起始于微观的局部变化。这也是本书所遵循的理论构思。

从内容来讲，本书较详细地论述了北京市个体户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分析了个体户在北京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个体户阶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成长的过程。个体经济迅速发展对城市市场机制形成、政府职能分化以及城市社会结构分化和整合的重要影响，从这些论述中都看得十分清楚。作者将三十多万字的书稿分为上下两篇共十一章，逐步加以论述。上篇是总论，下篇是分论。每章各有重点。在下篇分论中讨论了街面上的个体户、胡同里的个体户、租赁柜台经营的个体户、集贸市场里的个体户共四种身份类别。每种各有特色，论述生动，引人入胜。

作者在本书中深入研究了个体户，给予它正确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这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的学术专著。它对我国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对有关政府部门的决策都会起到促进作用。因此，我愿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书。

在当前学术著作出版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视学术著作，同意出版这本书，我作为作者的导师向出版社和责任编辑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即将出版问世前，作者要我为其写序，我是高兴的。因此，写了以上一些看法以为序。

袁 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二日

前 言

研究选题及思路的形成过程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它是在我的导师，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袁方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写成的。早在我刚进入北京大学当研究生时，袁先生就对我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实质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社会学作为以社会研究为本的一门学科，首先应高度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结构变迁。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将是中国社会学责无旁贷的历史性任务。先生进一步建议我将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作为我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这对我以后研究取向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的研究思路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直接得益于我在北京大学的社会学学术小圈子。这里有一批出色的中青年社会学家。

80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学老前辈费孝通教授“小城镇研究”的带动下，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在全国各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社会学研究被正式纳入国家的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但随之而来的是，在社会学研究上出现了急功近利的趋向。其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不加分析地照搬国外的社会学理论模式和结论，用来“套”中国的现实。我们认为，这种倾向对于刚刚起步，尚处于重建期的中国社会学来说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忽视了社会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门扎根于本土的学科。社会学理论的营养来自活生生的现实社会过程，而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应开始于对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的忠实记录。事实上，中国社会学在理论上的成熟

还需走过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中国的社会学家应该向西方社会学学习，但决不是照搬现成的理论，而是借鉴其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剖析社会现实的理论眼光。中国社会学者应该具有甘于寂寞的精神，沉到社会中去，大力开展本土研究，尤其是对社会现实的描述性研究。

从1988年开始，我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王汉生博士、林彬博士、原国务院农研中心研究人员吴曲辉、现美国 Duke 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张杰等人获得了一个研究共识。我们一致认为，中国改革后的社会发展演化出了一个极为丰富的社会变迁现实。它提供了中国社会学在恢复后振兴的天赐良机，为形成我们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流派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但是，立足于肥沃的研究土壤，刚刚恢复的社会学学科远未形成足够的研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中国社会学要想对社会的发展有所作为，就应该努力克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而从学科基本建设角度来开展研究，进行较长时间的理论积累。即，首先对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建立起社会学的学科判断，从而形成社会学的理论眼光，进而寻找到一个研究的突破口，不断拓展，经过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努力，产生研究的积累效应。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从忠实地记录、描述现实社会变迁开始做起。

经一年多的理论准备，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理论判断：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的结构性分化。这种分化的实质是中国正从一个同质性社会向异质性社会转变。这一转变引发了社会结构构成样式的变化，并导致了社会位置的重新分配。与此同时，在结构性分化中蕴涵了社会整合的基本方向并形成了对未来中国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基本内容。这一思想外化成为我们的一篇理论文章：《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上。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我们于1990年春天设计并实施了河北正定、陕西宝鸡、上海昆山、内蒙赤峰四县的农村社会结构分化与整合的研究。研究成

果发表在《中国农村社会与经济》杂志上。

1991年8月，当我的个体户研究已铺开时，一次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与来访的美国Catholic大学华裔社会学教授李哲夫先生座谈。我介绍了我们的社会分化研究思路和我正在做的个体户研究。他对我们的研究思路表示浓厚的兴趣，同时又感到困惑不解。他认为从研究农村社会分化一下跳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间并无任何逻辑联系。

其实，我选择个体户研究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纯属一种偶然的原因所致。

1990年夏天，我正考虑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一天在我的朋友郭某家里吃饭，席间有一位搞制冷设备修理的个体户马某。当他得知我搞社会研究时，就借着几分酒劲说：“你们这些搞研究的人其实对社会一点都不摸门儿。你们可知道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说句大话，我们这些个体户比你们懂得多。就拿我们个体户来说，现在北京市市民光早点一项就有80%靠个体户解决。北京的个体户已分为三拨：一拨是得过且过，挣了钱就胡造的主。第二拨不仅要求已得到的经济地位，还想‘挣’社会地位。个体户是等公民，怎么办？捐门槛！怎么捐？我们许多人读书劲头一点不比你们差。做服装的研究解剖、绘画，做厨子的研究营养学、美学。不少人自己花钱上学读文凭。我是修冰箱的，现已是北京第一批个体工程师，北京制冷协会理事。我还计划去日本深造，再返回北京成为制冷大王。书店里有关制冷的书都让我买绝了。第三拨转化成为国际倒爷。一些发了财的‘大款’花钱买护照，把摊儿‘练’到了莫斯科、布达佩斯和布拉格。你能小看这些个体户的作用吗？实际上，个体户已占有了北京市的半壁江山。”接着，他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从小就是个苦孩子、孤儿。后来有了个体户政策，开始靠蹬三轮车糊口，最后一步步成为今天的制冷专家。然后，他又谈到了社会对个体户的不公正和许多与个体户有关的社会问题。末了，对我说：“哥们儿，如果你真有心要研究我们个体

户，向社会说说我们的酸甜苦辣，我小马愿鼎力相助。”

这一偶遇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思想震动。我凭直觉感到在个体户发展问题上凝聚了大量城市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但是，能否真去研究个体户，觉得并无把握。客观上讲，作为一个在北大校园里做学问的人，无论从生活背景、文化背景还是价值取向上我与这一群体都存在极大的反差。然而，小马讲述的内容却使我难以忘怀。不久，我又通过朋友认识了第二个个体户：在西单“练”服装摊的D. S。他给我讲了不少个体户的故事，也同样表示愿意帮助我搞研究。这时，我开始觉得这项研究值得一试，并考虑把研究个体户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在两个个体户讲的故事中，我脑海里出现了第一个轮廓，即个体户的社会交往模式，尤其是他们的小群体互动圈。这样，形成了我的第一个研究设想：希望做一个类似于美国社会学家怀特的街角社会那样的小群体研究。我拟订了一个参与观察的研究计划，并坦诚地将我的研究设想告诉了D. S，希望求得他的帮助。D. S非常义气地同意帮助我，并表示愿配合我的研究。于是，我于1991年初开始频繁地与D. S及他的伙伴们进行交往。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D. S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教我学习个体户的语言，把我引荐给他的个体户朋友，甚至承担了我调查过程中的相当部分不可报销的交际费用。

进入个体户圈子后，随着了解面不断扩大，我发现值得研究的东西远不止一个个体户的小群体互动模式。与个体户的经营活动相联系着的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全方位调整。他们的社会行为中体现的是社会业已形成的复杂的利益交换格局，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改革后社会分化促成的社会整体的重要变化。我觉得应重新考虑我的研究方案。为此，我暂时退出研究现场，重新调整研究思路。我认真地研读了严景耀先生的《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费孝通教授的《江村调查》、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彼德·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与交换》、C·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特纳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等著作，从

这些理论前辈的著作中汲取他们的方法论营养。此外，还认真分析了已获得的一些资料，主要有西城区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国家有关个体户的政策文件，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北京市劳动局的研究报告《北京城镇的私人雇工》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个体户纪实性文学作品。我逐渐形成了新的研究眼光，认识到个体户作为在改革背景下形成的一个新社会类别，其类别特征实际上包含了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内容。最后，我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能否以个体户作为分析点，去探究城市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和特点？经过一个多月的理论研究和思考，这一研究设想最后转化成为我的论文研究方向，即试图以个体户发展的过程和现状为出发点，去描述和分析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在改革开放后发生的结构分化的进程。根据我对个体户的初步了解，我以个体户的基本运行方式为研究的入手处进行研究的总体设计，并把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个体户在何种程度上牵动了北京城市社会结构的调整？个体户的运行模式对目前我们看到的现实社会运作方式作出了多大贡献，是什么贡献？

这一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案形成后，得到了导师的大力支持。于是，我于1991年4月正式按研究的设计进入了研究现场。

研究现场的进入

按研究设计，本研究是一项定性研究，同时，又是以事实描述为基本特征的先导性研究。这就决定了研究不可能通过问卷方法去获取资料，而必须采用实地研究法。研究应循现象事实→概念→命题→理论的路子展开，即在大量经验证据的基础上提炼出概念，把对现象的表层认识上升为理论上的因果性分析。据此，研究应该在一定的效度保证下，在一个有限空间集中进行，而不能在广大的社会中“撒大网”。我选择了北京市西城区作为研究现场，并将西城区的西长安街作为研究的重点。基本方式是：将西城区视为一个边界清楚的完整社会总体，而将西长安街视为在

这一社会总体中的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社区，假定社区内研究对象的分布与社会总体同构。这一设计的效度主要由以下三条加以保证：

一、现场进入的可能性。研究能否成功的首要条件取决于研究对象的配合程度。我当时所认识的个体户全部在西城区范围内经营，而且我们之间已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这保证了现场观察的可靠性和资料来源的信度。此外，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沟通了与西城区有关部门的联系，包括西城区计委、经委、区个体劳动者协会（以下简称“个协”）、区工商局和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及个协分会。这一进入条件具备后，就保证了研究设计操作和实施的可行性。

二、局部社区对社会总体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这是建立在西城区与北京市社会整体在结构上完全同构的认识基础之上的。目前，北京市的街区划分仍是同一标准的行政区划，因此，各区、各街道之间虽有规模大小之分，但并无本质之别。区、街的社区组织方式和结构特征都完全相同，区、街政府的行为方式也别无二致，这就保证了以局部推及整体的可行性。

此外，北京社区结构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北京市 1986 年推出一项社会改革措施，即将街道办事处由原来的区政府派出机构升级为一级“准政府”，行使一级政府职能，以强化社会管理。这样，街道作为一级政府的辖区，其边界就有了行政区划的意义。无论从经济行为还是管理行为上，街道都成为相对独立的完整社区；街道的居民们不仅有“我们感”，街道的行政关系以及社会、经济的运行，也都具有了“内循环”的社区特征。

因此，北京城市社会就形成了在统一行政关系下，市、区、街三级社会在结构上完全同构的构成样式。据此，在本研究中，我有充分的依据将北京市看作西城区的结构扩大；同理，西城区也是西长安街的结构扩大。反之，一个共层社区则是社会总体的缩影。

这样，我以西城区及西长安街街道的情况推论北京的设计思路可以成立。

三、北京不同区、街的个体户基本特征的高度同质性。

1. 各区、街个体户在行业分布规律上具有相似性。无论处于西城区还是东城区的个体户，其发展过程都是在同样的社会背景、同样的政策规定、同样的起步方式、同样的管理方式下展开的，因而，在行业分布结构的比例关系上十分接近。如，个体户经营最集中的商业、饮食、服务、修理四大行业在城区各区的分布比例关系如下表所示：

表 1 1987 年北京市 6 个区商、饮、服、修
四大行业个体户比例表

	个体户总户数		商、饮、服、修户数	
	数量	%	数量	%
东城区	3011	100	2576	85.4
西城区	2268	100	2728	83.4
崇文区	3043	100	2098	69.3
宣武区	2765	100	2116	76.5
海淀区	4424	100	3885	87.8
朝阳区	3889	100	3399	84.1
总 计	20400	100	16802	82.3

资料来源：《北京城镇的私人雇工》，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 186 页。

从表中可见，西城区个体户商、饮、服、修四行业占该区个体户总数的比例为 83.4%，而 6 个区总体平均水平为 82.3%。这说明，在行业分布的集中程度上，西城区对全市平均水平有较高的代表性。

2. 分布在不同区、街中不同类型的个体户在其基本行为方式上不存在显著差别。这是由于北京个体户都具有完全相同的外在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因此，西城区个体户的行业分布状况、个体户发展水平以及个体户的基本特征在总体结构上都反映了北京市的基本情况。

上面三个条件为本研究的经验效度和理论效度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研究方法及资料搜集

按照本研究的设计，研究试图通过对社会微观运作层的描述和分析，逐步上升到宏观层的理论提炼。根据社会学定性研究的方法论要求，研究所依据的资料不仅是各种统计数据，而更在于现场搜集的各种直接经验材料。这决定了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我在历时 14 个月的调查中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种方法：

一、参与观察法。前面提到，我通过朋友的引入与一个个体户小群体建立起了相互信赖的关系。一开始，我的研究身份只有该群体的“领袖”和少数几个重要成员知道；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群体的所有成员都知道了我的身份。但这并未影响到我的观察效果。因为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他们已将我视为“哥们儿”，而不当外人看。相反，由于我和他们的身份反差使他们似乎更愿意跟我讲心里话，讲他们的苦恼，讲他们的生活，甚至还主动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

我与该小群体成员保持了一年多的关系，观察的内容主要涉及两大部分：

第一，经营活动。我十分仔细地观察了他们从进货到销售的所有环节，了解他们的货源关系、经营方式、群体成员之间的经营关系、与伙计的主雇关系、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关系。为熟悉和体验他们的经营活动，我甚至一整天地和他们泡在柜台上卖货。

第二，社会生活圈。包括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家庭关系、社会交往关系、价值准则、社会生活交往规则。我曾多次参加过他们在不同场合与不同人的聚会。

在观察过程中，我做了大量的现场观察记录。全方位的参与观察，使我对个体户的行为方式有了更多的实感。一段时间之后，我对他们的生活变得熟悉起来。记得有一次调查完回北大，和其

他博士生们一起聊天，他们都说我从说话到行为都越来越像“练摊的”了。尤其腰里掖着一盒“万宝路”那派头，活脱脱就是一幅“倒爷”相。

二、个案研究。严景耀先生 30 年代在监狱里对犯人进行访谈的方式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他在讲述他研究的体会时这样说道：“我发现从问卷到回答中不能找到很多材料。最好的材料往往在‘备注’里。问卷是凭我主观想象制成的。问卷的回答使整个情况一致，但有许多要点被抛开了。所以，到 1928 年春天后，我放弃了问卷，采取和犯人个别谈话，以一般问题为基础，顺其自然地谈下去。然后我发现犯罪的研究牵涉到许多其他社会问题，而且与其他社会问题密切相关。我开始认识到犯罪与社会环境的有机关系。1930 年，当我从一个土匪头头那里得到他的故事，我发现他的故事不仅是他的传略，而且是我所生活的时期的社会现象。我注意到搜集他的生活史、累积其他犯罪者生活史的重要意义。”^①

这说明，在社会发生剧烈变迁时，社会成员的个人生活史是整个社会变化的缩影，其中包含了大量有关社会变迁的重要信息。在我和个体户小群体的接触中，已经强烈地感到，在个体户的发家过程中，在他们日常的经营、进货、社会交往以及形成的规则、观念、态度、看法中，蕴涵着十分宝贵的可供理解社会变化特征的分析资料。因此，我在参与观察已获得一些体会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份以个体户个人生活史为主线的结构性访谈提纲。然后，我在西城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及西长安街个协分会的协助下，根据个协成员的基本情况统计资料，认真分析了个体户的成员分类情况及行业分布情况，挑选了我的个案访谈样本。

北大社会学系的几位研究生在访谈调查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配合我先后共访谈了约 50 名不同身份、不同行业的个体

^① 《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 8 月第 1 版，第 211—212 页。

户，整理了约 30 万字的个案材料。本书中我完整地引用了其中的部分材料，并以此作为分析的主要依据。

除了对个体户进行个案研究外，我还根据调查的发展需要对国营商店的经理、执法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很了解历史情况的老管理人员、政府部门的官员等作了大量的针对性访谈，涉及了不同系统的十余个部门。

个案和访谈材料的记录根据不同的情境而分别采用访谈后的回忆整理、现场笔录和录音记录三种方式。

三、文献研究。随着研究的展开，我感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是怎样获得能反映个体户十年发展历史状况的资料。虽然在访谈中了解到了大量情况，但都支离破碎，很难从中分析出历史发展的全貌。而且，在这些不完整的情况中，我愈加感到要真正理解个体户的现实运行方式和对社会的影响，就必须搞清这种运行方式在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中的来龙去脉。

后来，有两条线索帮助我解决了这一难题。

第一是政府的政策法规。我注意到，国家有关个体户的政策法规实际上有一个逐步完备的演进过程。从第一份简单的政策文件到今天较完备的政策法规体系，是经十年时间不断发展起来的。而这一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实际上凝聚了个体户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内容。每一份文件和政策不仅构成了当时个体户发展的外在制度性背景，而且还包含着国家根据个体户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所作的结构性调整。

第二是有关管理部门的历史档案材料。这部分材料清楚而准确地记载了每一个年度政策执行情况、各种问题分析、数据分析、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形成过程。

于是，我详尽地搜集了自 1978 年以来到 1991 年包括工商、税务、物价、计量、劳动、个协、街道等部门有关个体户的所有重要政策法规文件，并在北大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杨力伟的全力配合下，在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后，扎进了历史档案堆中，历时一